

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乡村改造的实践回顾

——从消去的无政府主义提取当代价值

◇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王海侠

摘要：无政府主义^①作为整体行动，似乎已注定只被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而且是一种被尘封的记忆而留存；但是无政府主义（此处尤指共产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与理论资源，其历史意义与价值却远非局限在某一时代。在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回顾中，发现无政府主义的许多思想（互助论的阐发、对资本的批判、社会革命的主张），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话语却消失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它既不是可资借鉴的思想，亦不再成为批判的对象。可实践总是先行于理论，被理论界所忽视的无政府主义，却在新时期的乡村建设之中被重新认识和运用。这表明无政府主义的隐退只是表象，实质上它在现实的土壤中依然有生命力。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 互助 社会革命 乡村改造想象力

49

一、无政府主义遭遇的时代冷暴力

毫不夸张地讲，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都几乎没有了解。唯独的一点了解恐怕也是最庸俗的自由经济学变种的无政府主义——反国家、反政府，或让国家做守夜人。其实这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陈述，但却被大部分人归于无政府主义名下。我们对无政府主义基本没有了解，或是只有误解。然而，误解还不是无政府主义最悲哀的命运，误解还要以些许关注为前提，而悲哀的是它连一丝关注都没有得到。用汪晖的话说：“不仅作为可用的理论资源的无政府主义消失在我们的讨论之中，甚至连作为供批判的无政府主义也一样消失在思想界的话语之中。”^②它被放进历史的博物馆中，无人问津。

^①无政府主义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主要包括三个面向：个人无政府主义、工团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虽说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三个不同分支，其间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在理论与实践的本质层面，三者之间的张力亦非常巨大。如果将三个面向的无政府主义放在一起讨论，势必会带来诸多混乱，同时，也非一篇小文可以囊括。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仅是后者——共产无政府主义，尤以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阐释为核心。

^②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专题”课程上的谈话内容。

无政府主义已经被历史判了死刑，作为一种思潮的它，已经隐退；作为行动的它更是被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是被实践所证伪。然而，只要能摒弃成见，重读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就可随之打开另一种世界设想。本质上讲，无政府也是乌托邦思想，但它所呈现的绝不是莫尔的“乌托邦”，也不是康有为的“乌托邦”，^①因为这些乌托邦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桃花源”诉求，而无政府主义所构建的世界却相当入世，它更关注社会问题与重建理想社会的手段与张力。另外，在对待无政府主义“新世界”设想方面，亦不可纠结于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否可能的问题，无政府主义就是在对理想社会的纯粹构想中触及了社会建设中所可能面临的核心问题与潜在矛盾。

在谈及无政府主义时，需要提出：请将作为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和作为行动或实践的无政府主义区分开。无政府主义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可以指导多少实践，取得怎样的社会成就；而在于它对一切不公平进行孤注一掷地反抗，对道德理想的呼唤，对行动者的警醒，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以梦想。它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思想召唤和行动指导方面，而不是切实的成绩。对待无政府主义切不可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急功近利的心态，如果以这样的态度去认识它，它只会将自己隐藏得越来越深、离我们越来越远。

无政府主义，不仅在中国，可以说在全世界，关注它的人都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它现在遇到的对手不是火热的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而是已经没有人再与它对话了，这是一种时代的冷暴力，再深刻的思想在独白中也只会日渐消亡。恳请读者放开想象，打破已有成见，相信随着对无政府主义的了解，我们会慢慢地被它的理念所感动，被它丰富的论述所折服。

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锋芒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曼彻斯特主义（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观点）同共产主义交媾。”^②这句话可以说是异常精辟地概括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根源及其秉承的特质。这句话原本是以批判的角度来指证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性。但对于这句话，却也可有不同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它虽指出了无政府主义潜在的问题，但也为理解其核心观点打开了窗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平等理想的共产主义可作为理解无政府主义的两条线索，在

^① 指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所描绘的“去九界”的新世界。参见[清]康有为（2005）：《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普列汉诺夫（1980）：《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88页。三联书店。

关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述中可交替使用这两种思想倾向。下面先来总结一下（共产）无政府主义的几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及闪光点。

（一）互助主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挑战

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其所带来的震撼并不仅仅是彻底改写人神关系，更是连同人类族群的内部关系也一并改变^①，不过这种改变更多的是体现在书面上、理论上，而非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然而就是这种理论上而非实际生活上的转变，却带来了智识与教育的革命，使得“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成了真知，亦成了目前社会的生存法则。个体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恃强而食人肉者，但却时刻担心成为别人的鱼肉，这也是社会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缘由。

其实，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在实践生活面前站不住脚，经不起人类生活千百次实践的检验，从我们真实的生活情境出发，一定可以看出对任何人来讲，他们都渴望得到真诚的帮助，并且时刻会给予别人帮助，给予弱者同情。一面是生存法则的铁律，一面是日常生活的含情，这俨然是一个悖论的世界，但这种悖论却不曾在我们的头脑里打架，理论宣称与生活实践像平行线一样，各行其道，互不相干。

似乎人们习惯了谎言，并不曾想去揭穿它。但有这么一个“热情的叛逆儿”^②、一个“前进的科学家”^③——克鲁泡特金，指出了其间的荒谬，系统地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分析，用大量的生物与社会性事实提出了与其相左的论点——“互助”才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第一法则。

首先，他指出达尔文进化学说的真正意义以及后来所遭受的曲解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狭隘。克氏不是第一个意识到问题的人，一些敏锐的学者也发现了达尔文学说被曲解。《19世纪》杂志的一个编辑曾说过：“‘他们’把达尔文的话弄成那种样子，真是可怕。”^④达尔文在对进化学说进行阐述时，其所指是作为生物进化要素之一的生存竞争如何起到作用，同时其所指适用领域是不同的物种之间的竞争——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有的物种存活下来而有些没有。但他没有试图在同一族群内部引入这种优胜劣汰的论述。并且，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如果狭

① 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因为虽然生产进化的观点已普遍深入人心，将同时演化的竞争学说当成真理。但从实际的人类生活中来看，更多的还是互助、合作，而非竞争与厮杀。

②③ 巴金（2009）：《无政府主义批判——克鲁泡特金在中国》，序，第7页。江西高校出版社。

④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11页。商务印书馆。

义理解这种生存竞争——各个个体之间完全为了争取生活资料而进行竞争^①，将会是危险的。达尔文坚持着将他的理解与潜在忧虑写进了著作之中：“这个词当作广义的和比喻的意义来用的，其意义包含着这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也包含着个体生命的保持以及它们能否成功地遗留后代。”^②

可是，他的追随者们却无视这位先哲的重申与暗示，一味地对其进行狭隘的解释，任其发展，结果是变得越来越狭隘了。“他们甚至变得把动物世界看成是在半饥饿的个体间永久的斗争，并彼此想吸取对方血液的世界。”^③并认为人类社会也同样服从于这一生物学原则。

在陈述了达尔文真实概念所旨及追随者的误解之后，他在《互助论》中用了整本书的篇幅考察和分析动物与人类间的互助、动物间的互助、蒙昧人和野蛮人的互助、中世纪城市的互助和现代人之间的互助。他用非常详实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人世间互助的恒常，表明“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④他还称：“那是比爱或个体间的同情不知要广泛多少的一种情感——在极其长久的进化过程中，在动物和人类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本能，教导动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实践中就可获得力量，在群居生活中就可获得愉快。”^⑤总而言之，互助是比互争更加基础和广泛的自然法则和进化要素。

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对“互助论”的吸收中进行了引申。针对当时社会过分偏重竞争，鼓吹弱肉强食的状况，他们强调互助比竞争更高级。^⑥他们认为竞争导致世界的残杀，亦指出：“人谓世界无竞争，则无进步。吾更言曰：无互助则更无进步，且欲竞争而不能。”^⑦生物之间由于互助的天性，同种之间相互帮助、提携，不仅增加了对外竞争的力量，也促进了物种内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与异种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互不侵犯，从而达到避免竞争的目的。所以“物类之发达而恒久非互助莫由”。^⑧只有当互助与竞争并重，不柔不烈，相遇得当，无过无不及之患，是谓最得进化之大道。^⑨

在互助与竞争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克鲁泡特金成功地将二者融入一起进行讨

①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15页。商务印书馆。

② 达尔文（1954）：《物种起源》，第62页。三联书店。

③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17页。商务印书馆。

④⑤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10页。商务印书馆。

⑥ 主要是一战爆发后，主张西学的青年开始意识到竞争学说存在问题，这从相反方向促使他们思考互论的意义。

⑦ 《无政府说》，《新世纪》第36号，1908年2月29日。

⑧ 李妙根编（1996）：《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第24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⑨ 《无政府说》，《新世纪》第36号，1908年2月29日。

论,指出竞争广泛存在,但互助更为基础。他并未因强调互助是生物进化的第一天性,而否认竞争的作用。对此他做了如下表述:“我不是否认生存竞争,但是我认为动物世界的逐步发展,特别是人类的发展,受惠于互助之处要远过于互争。”^①“合群与互争一样,也是一基本的自然法则。”互助性越强,物种越兴旺;互助性越差,则物种越有被淘汰的迹象。互助不仅构成了生存基础,同时也构成了道德的基础。而就是由于这双重基础的被忽视,人类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吴浪波据此指出:“人类社会由于没有意识到互助才是进化的主要手段,盲目地崇尚竞争,忽视互助,结果导致道德沦落,人心不古,冲突与战争频仍。只有重视并提倡互助,废除为竞争需要而设立的各种强权,人类才能发扬天性,并避免人道、公理的沦落。”^②

互助理论比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关注具体的历史实情,同时互助论亦更符合人们的日常感知。暂且不理睬理论的孰是孰非,在这个大谈特谈竞争的年代里,现实仍是人们互助多于争夺。运用真实感会清楚地发现,正如克氏指出的互助是自然界的第一生存准则,一个群体的进步有赖于内部的互助程度,互助程度越高,繁荣与愉悦程度亦越高。

(二)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亿万普通群众的痛苦与流离,它指出资本主义本身正是通过制造贫穷而使部分人富裕起来。在文明社会中,工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它生产的物品足可供所有人使用。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穷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普遍群众喋喋不休的疑问,是一个世世代代的梦魇。克氏指出:“这种现象是因为在那强夺盗窃、被胁迫的移民与战争、愚昧无知,以及压制等等的长期历史的进程中,生产上所必需的物品,如土地、矿山、道路、机械、食物、住居、教育、学识——尽被少数人强占去了。……那少数人凭借着过去所获得的假定的权利,依旧垄断着现在人们的劳动产物的2/3,然后使用极愚笨的、极可耻的方法来浪费这许多抢夺来的东西……少数人禁止其他的人生他们的必需品,而强迫他们去制造那些于大众的生活不必要而于独占者却有最大利益的东西。”^③他将此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部本质。

针对这种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他指出其中的不公正所在:“几百万人不停地劳动着,创造出我们现在夸耀的文明。又有几百万人不停

①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20页。商务印书馆。

② 吴浪波(2005):《互助论在清末的传播与影响》。《中州学刊》第2期,第156页。

③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42页。商务印书馆。

地劳动着来维持这文明。要是没有了他们，不出五十年，我们世界除了留下一片废墟外，什么也都没有了。……即便是一种思想，一种发明，无一不是过去和现在所产生的公共财产。”^①

然而，资本主义的制度，却使其偏离了正轨，任这种独占行为蔓延至整个社会，那么它就只有坐待灭亡。所以，克氏提出了他的社会生产与分配理论：“个人的占有是不正当的，而且是有害的。万物属于万人，万物为万人所用。因为万人需用万物，因为万人用全力来生产万物，因为在世界财富的生产中不能估计出每个人的一部分来，所以万物是为万人所有的。”^②万物被万人所有、所用，一切的生产也要为了万人的安乐而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不仅没有面包，同样没有自由。因此，他首要做的就是满足人们对面包的需求——一切与物质有关的需求，衣食住行等等；同时，除了基本的生存满足外，还要还人民以最珍贵的东西——自由。自由，不单是我们字面上的自由意志，还包括了人的全面发展。劳动人民可以有艺术的追求，可以有体脑劳动的结合，可以有不同工种的工作。他们不是一个只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人，不是一个没有任何艺术与知识渴求的人，更不应该被迫害成像卓别林扮演的只知道拧螺丝的神经兮兮的人。

在克氏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和谐、丰裕的社会，可以见到健全发展的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其赤裸裸的经济与社会现状入手，再到呈现给人们一个不一样的新世界蓝图，可谓有破有立。

（三）超越政治革命的全面革命理念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华民族深深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也成了知识分子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几乎每一种思想的引入，每一次论战的爆发，都与这深深的民族情怀有关。无论哪一派，如《东方杂志》与《新青年》，虽说一边以保守派示人，一边以激进派闻名，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如果不去考虑二者真实的历史作用，不能不说两者的初衷都是要寻求真正的强国之道！

近代知识分子与民众几经探寻，却无不以失败而告终。随着共和梦被袁世凯毁灭，一代人重又陷入了几近绝望的探索之中。此时，无政府主义随着新一轮的探索而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虽然它是以极端的反政治面目出现，但这也同样是一种政治表达。与以往社会改造的方法不同，无政府主义并不赞同用政治革命

^①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48页。商务印书馆。

^② 克鲁泡特金（2012）：《面包与自由》，第49页。商务印书馆。

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点也使它与马克思主义结下宿怨。在无政府主义看来，政治革命的结果并不是消灭权威，而是用另一种权威来替代原有权威，其结果还是权力的集中、自由的压抑。他们主张：“革命的目标不是创造一种新的、延续着社会分裂和冲突的霸权，而是完全消除霸权的概念。”^①

相对于一般的政治与经济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更看重社会革命与平民革命，同时将文化革命视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关于这三种革命的观点，在众多理论流派中，无政府主义的表述最早，最系统，也最有深意。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妥协地否定政治，并且“把社会指定为唯一适合于革命话语的对象”，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恢复政治秩序的革命要求是政治‘自然化’的结果——‘没有政治就无法想象社会’就成了一种最根深蒂固的、保持着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意识习惯。这种解释使他们不是把意识形态领域而是把社会话语领域作为维持政治和社会压迫的权威和奴性习惯的蛰居之所。”^②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没有政治就无法想象社会”这句话所表达的复杂含义，当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变得政治化了的时候，也就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抑制了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与可能。无政府主义者在强调改造社会之时，着眼的不是形而上的意识领域，也不等同于形而下的经济或物质领域，而是像“生活政治”的学者那样，关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与规则，及人们身居之处的种种习以为常的事物。只有我们从“入地”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对社会革命的情有独钟，才可真正领略无政府主义者的深刻之处。比如，他们是坚定的反家庭者，因为他们认为家庭是万恶的起源，是最最私有与狭隘的表现。他们是坚定的反姓氏者，认为个体不应该有归属的牵制，没有姓，只有名，这是一大批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体行为。如刘师复，为表示与家庭的隔绝，去其姓，而名师复。他们是坚定的妇女解放的呼吁者和身体力行者。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如果一半的人仍处于男权之下，又怎会有一个无压迫的新社会？同时，他们还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或西文。因为，他们认为语言决定文化、决定思维，中国的汉字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思维，使之不能产生西洋之大众科学研究与思想。此一主张引起了很大反响，章太炎专门写文章予以反驳。但不论其方法与思想得当与否，从其主张之中，可以看到他们是立足于从最基本的社会及生活层面入手，“革命的最根本目标是改变在日常生活基础上构成的社会话语”^③。这是一次更为彻底的革命。

①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3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而立足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社会革命，还需有其他的手段予以辅助，否则社会革命如何取得成功？在无政府主义者眼中，社会革命又与文化革命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集中将文化革命作为改变社会的最基本的手段；文化革命不是用来取代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变化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有了这个阶段，新一代人才明确表达出他们内心的要求”。^①文化革命的要求是赞美新的、否定旧的，可是它真正的立意是集中否定中国传统之中那些能再生“统治和顺从的社会关系”的机构合法化方面。就如想要培养健康的作物，一定要净化其生长的土壤一样。文化革命就是要去除人们头脑中那些陈腐的思想，并将道德置于文化革命的中心。因为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本身就是道德的革命，他们为之而奋斗的社会是一个社会道德高度纯净的社会。

此时，就又触碰了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层面，即教育。克氏提出“教育即革命”的口号。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教育目标是“创造一种新型的中国人，即在精神劳动和手工劳动方面都同样熟练的‘完人’”^②，完人是道德的，亦是新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把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复杂的他们认为是统一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完人’身上。”^③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强调人的天性中“互助”和“合作”倾向要超过竞争和分裂，将互助与劳动视为无政府主义的道德。其中，互助是无政府主义的基石，而劳动是道德与人类天然美的表现形式。无政府主义就是要通过这种新型的人，在个人革命的基础上去深化社会革命。因此，“工读计划”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教育的主要形式，旨在“随着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工人将变成学者，学者将变成工人，将创造出一个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新社会。”^④“工读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可能是蔡元培，他不仅把这种结合当作解决青年教育问题的手段，而且还把它看作是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的手段。^⑤

这种从文化及教育更深层次介入中国变革的期望，并不仅限于无政府主义。可以说整个新文化运动以来，都存在这种倾向，而无政府主义是各理论中最系统、手段最坚决的一个。当我们重新回顾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思想潮流在新文化思想运动中所形成的影响时，定要将其看成是在思想领域寻找解决具体问题途径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人的革命”，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场思想运动或具象化的思想革命。

①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③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 黄凌霜（1918）：《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劳动》第4期，第178页。

⑤ 蔡元培（1932）：《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蔡元培言行录》，第555页。

此外，就是在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力倡之际，不得不提的另一革命诉求，即平民革命。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军人物刘师复，认为“政治革命是英雄们的革命，少数人的革命”，而“社会革命是平民革命，广大群众的革命”。^①真正的革命是要平民参与的革命，“以倾覆政府者”必须“使大多数承认之赞成之”。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做得很少^②，但他们最初对于民力的注意与民智的调动，为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借鉴。

三、无政府主义历史影响之一瞥

上述部分一再指出无政府主义所具有的理论锋芒，虽然在历史上这种理论锋芒并未曾真正作用于实践而成就真正的革命，但是无政府主义却通过它强大的反思力与理论张力而完善了真正的革命者。再坚定的革命者也会有痛苦和彷徨的时刻，也会有迷茫于革命手段与目标的时刻，这是越“纯粹”的革命者要面对和难以克服的障碍，而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者，却可以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执着稍加安抚内心的焦躁，通过无政府主义革命手段与目标的反复重申而稍加弥合心中的悖论。下面通过三个革命战士来看一下无政府主义对他们所起到的完善与警示意义。可能这种警示直至今日也同样值得思考。

（一）鲁迅的无政府主义知音

透过鲁迅犀利的笔触，看到的是一个保持昂扬战斗姿态的鲁迅，可是鲁迅在看似坚毅的外表背后，内心却有着深深的矛盾与孤独。他的矛盾，是因为他要面对最难以接受的事实——“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③他的孤独就是很难找到如他有一般经历与情感共鸣的人。谁能懂他心里的内在斗争，谁能明白那一哀一怒之间的百种情怀。他自述了这种孤独之感：“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起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④也许他会一直这么孤独下去，但生活给了这个战士一个慰藉，他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

①刘师复（1927）：《师复文存》，第131页。革新书局。

②虽然实践较少，但他们的先行与示范意义很大。见本文第四部分“中国乡村改造之无政府主义实践”。

③鲁迅（2005）：《鲁迅全集》，第11卷，第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④鲁迅（2005）：《鲁迅全集》，第2卷，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到了共鸣，找到了知音——阿尔志跋绥夫^①。鲁迅与阿氏达成一种心灵的契合，鲁迅似乎可以与其一同奋战，一同分享自我的消解与重构。

鲁迅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接触很多，并且翻译了无政府主义的几部作品。虽然被众人所知的是《工人绥惠略夫》，一个浸透了革命者孤独、悲愤以及由爱而憎，终致向群众复仇的角色。但我发觉，在鲁迅与无政府主义作品分享那类似的无奈与彷徨时，他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深层的那丝希望底色的感染。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梦”，年老的时候，又何尝没有梦？鲁迅一直以反抗绝望的形象出现，然而，正如他所说：“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所有的抗争、努力，他带病坚持写作的坚韧，并不仅仅是“与黑暗捣乱”，而是心中有希望在，这种希望由于过于缥缈，而成为连他本人也不愿直面的乌托邦。^②不过，还是要承认，鲁迅也是有梦的。《秋夜》中的那朵极细小的粉红花就在寒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

（二）李大钊“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一般人很难想到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也曾有过关联。因为他一开始就几乎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指出过无政府主义的种种问题。然而这里面却也有一段波折历史。李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过无政府主义。他于1917年发表过《青年与老人》的文章，提到“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后，他便接触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指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③可以看出他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虽然更认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但同样认为“人类真历史”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发扬光大的历史，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主张“阶级竞争”与“互助”的同时并行。

同时，“李大钊发现克氏的理论不仅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武器，而且也是减弱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影响的武器。可以用它来修正阶级斗争的理论，使之与

^① 虽然阿氏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但其革命与奋斗的夙愿却是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相通的。

^② 张全之（2006）：《鲁迅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研究述评与反思》。《鲁迅研究：鲁迅与区域文化》第7期，第89页。

^③ 李大钊（1989）：《李大钊文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

自己强调人的能动性意识的观点相一致”。^①可后来，他还是决然地与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放弃了互助论，放弃了精神的改造，而认为“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可尽管无政府主义从他的思想中慢慢隐退，但无政府主义却仍然作为一种激情在鼓舞着他，构造一个梦想指引他。同时，无政府主义对个体的关怀、对群体互助的阐释，定会对他阶级斗争的思想做以补充。

（三）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大多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也如此。但其他人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相对来说容易厘清，而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到底多远多近，还是很难定论的事情。虽然谨慎的学者通常在指出其行动与思想底色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后，通常要添加一个偶然性的注解，即这些行为并不能表明毛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鉴于毛泽东早期对无政府主义的了解和实践（实行新村运动等），学界还是基本相信，无政府主义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烙下了挥之不去的一笔，并影响到日后的革命实践。

第一点即是关于平民革命的思想。平民革命被视为真正的社会革命，多数人的革命。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革命的动力是群众，群众基于互助的本能会自发地起来革命，不需要任何权威的指导。在这一理论输入中国的时候，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整合，使平民革命有了新的内涵。可以说，它在两个层面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反强权的平民主义，二是彻底的社会改造和总体的社会革命”^②。

毛泽东在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被毛泽东抛弃，是因为它的目标空幻性和手段的非现实性，不能满足救亡图存的需要，而非因其思想性的空洞。毛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革命斗争策略和手段，这就为作为思想的无政府主义留有了一定空间。抑或说作为一种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还会发生影响？有学者指出“在革命救亡的任务完成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对于毛泽东而言，仍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在条件适当的时候，毛泽东仍将回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立场与实践立场”^③。我并不知道这种回归的真实性有多少，

① 莫里斯·迈斯纳（1989）：《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5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② 尚庆飞（2008）：《短暂的启蒙与深刻的印痕——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现代哲学》第2期，第63页。

③ 尚庆飞（2008）：《短暂的启蒙与深刻的印痕——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毛泽东的心路历程》。《现代哲学》第2期，第60页。

只是直觉地觉得这种回归有较大可能性。

1970年，毛泽东对再次来到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到底要说些什么？天，是天道、规律；法，是世俗戒律；让老百姓上不尊天、下不畏法，这是一种怎样的平民革命意味？个中缘由，莫衷一是。斯诺后来在《生活》撰写的文章中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有些人认为其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但正解也好，误解也罢，斯诺的概括倒也有点意思，似乎能让人想到一个八旬老人的孤独，也看到他的倔强。可他又为何事而孤独？为何事而倔强？这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二步吗？这一步也许就是他所醉心的平民革命，可这一步太难，难到超过了建立一个政权、一个国家。

四、中国乡村改造之无政府主义实践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给人们反思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了实证支撑；而作为一种行动所取得的成就不大，但其先行与示范效应却不可忽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实践身兼几个“第一”：首先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劳工联盟的创立者（1917年）；其次是第一个促成革命运动向农村的转移；再次是第一个实践了新的教育形式和新的生产组织。^①总而言之，这种第一效应在“城”是工团建设运动，在“乡”是革命方向与实践的导入。

（一）历史上无政府主义的乡村改造与实践

如前文所言，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更具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基础的改造。在这方面，他们一方面做思想的推广和引导，利用自己的期刊连续发表走入农村和乡村革命的文章；另一方面，又躬行乡村革命，组建合作社与民团。

在思想推广上，比如梁冰弦在《乡村革命》中写到“一个宣统皇帝退让了权位，我们就认为革命成功，真是大谬特谬。千千万万的宣统皇帝在一乡、一镇、一邑、一省，作践平民，恣逞威福，我们始终没奈何他，这可算得成功了吗？所以要把中国扶到进化轨道上去，除非大举乡村革命！”^②又如《国风日报》

^①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李帆（2013）：《民国思想文集——无政府主义派》，第358页。长春出版社。

的编辑景梅九，主张“一种精神劳动与手工劳动、农工相结合的农村生活”^①。其副刊《学汇》也与这种主张形成策应，1923年6月发表了“农村运动同盟”草纲。这一同盟纲领是要推动农民组织，建立由这种组织组成的同盟，帮助农民获得土地，创立自治政府。^②

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旨的众多刊物上，留存了大量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革命的文章，伴随着这种乡村改造的呼吁，无政府主义也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交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关心无产阶级，而忽视了占世界人口80%的农民。基于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的判断，无政府主义更指称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时常是在发展“偶像崇拜主义”，而没有看到农村社会的意义。^③从对中国基本国情和革命条件的把握上看，无政府主义者第一个发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非工人。他们的乡村革命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城市暴动形成鲜明对照。（很难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略——“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与他当年受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多大的关联。）同时，还首先号召知识分子回乡治理家乡。《乡村革命》中亦有言：“曾不知家乡也就是国中的一个小区域，整顿好了，这便整好中国的一部分。要是这种人才结结实实各向自己的乡村号召群众，开发知识，讲求学问，培养能力，一致把地方皇帝摧拉灭绝，那时强盗失了照应的伙帮，也就做不出什么恶，我们梦想而求的民治岂不是立地实现了吗？”^④

相应于其理念宣传，无政府主义也确实做了许多乡村改造的事情。师复的追随者们在1910年代中期就已经进行了成立农村公社的试验。^⑤而景梅九亦在自己的家乡山西推动了一系列的合作计划。^⑥关于山西合作社传统的研究很多，学界多有疑惑说为何山西会在近代和建国后的合作社运动中一直走在前列，现在想想可能与20世纪初实行的一系列合作计划尝试有关。此外，“民团”组建亦属重要实践，民团作为乡村的自治组织，在保护乡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少陵曾评价说：“如湖南、广东二省的民团，确有基础，这几年在两省内的军阀与政府，常受他们驱逐或围困，虽其间不免有人利用，但是他们反抗政府的革命精神始终

①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农村运动同盟规约草案》，载《学汇》第236期，1923年6月29日，收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二），第673~674页。

③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④ 李帆（2013）：《民国思想文集——无政府主义派》，第358页。长春出版社。

⑤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⑥ 景梅九（2012）：《罪案》，收入《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145~147页。

不灭。”^①同时，这种“到民间去”的思想，随着无政府主义的宣扬，在五四运动时期变得非常流行，这一思想被其他社会实践者所接受，其影响超出了无政府主义的自身实践范围。在德里克看来，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农村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共产党员——彭湃，最初转向农村活动也可能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②

用一种追根溯源的态度来看，无政府主义定会是中国各种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因为他们在时间上、行动上是最早的。虽然他们没有形成蔚为大观的乡村建设运动，亦不像梁漱溟和晏阳初一样被当作乡建运动的开创者而不断提起，但这种历史的起点作用，可遗忘却不可忽视。先行者总是会在方法、手段等方面给后来者施以影响。

（二）当代“乡村建设”对无政府主义的部分吸纳和接受

在介绍了历史上无政府主义的诸多乡村实践后，可以对比考察当今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活动”，这样更有助于看待无政府主义的跨时代影响。讲到新时期的乡建活动，就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问题集中爆发的历史背景。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李昌平对“三农”问题做了最精炼的概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③农村社会凋敝、组织涣散、乡土社会日趋“原子化”，从而使乡土社会在面对自然灾害与外来力量时，越发失去对抗风险和自我保护的能力。^④

面对这样一个衰弱的“乡土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希望用行动来缓解三农问题。在这些实践型学者眼中，农村最大的症结在于“去组织化”后，村庄公共治理能力衰退和个体农民因不具有市场地位所遭受的利益盘剥。因而，对于恢复型的乡村建设活动，最主要的是使村庄再组织，对内整合资源，对外构建市场沟通能力。相应目标而言，合作社成为首要的乡建手段。乡建的合作运动大致始于2003年，时至今日已十余载。回顾这10年历程，可算是个逐渐被外界认可和重视的过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合作社，并肯定其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乡建活动也以合作社为依托，继而向相关领域做了延伸性发展，目前，又发展出CSA（城乡互助型消费实践）与社区大学等新的乡

① 三木（李少陵）（1984）：《民团革命》，载《民钟》（一）第12期，收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二），第709页。

② 阿里夫·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 李昌平（2009）：《我向总理说实话》，第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④ 贺雪峰（2010）：《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第10期，第124页。

村建设形式。

谈起今日之乡村建设渊源，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百年乡建”的现代余波，是梁瀚溟与晏阳初后继者的当代实践。但从本人与乡建实践者的长期交往中发现，他们的乡建理论与主张，虽主要传承于此二人，但在实践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其它的理论资源，其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被部分乡村建设者们认同和使用。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①主任邱建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到：“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批判最力的当属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互助为一种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描述通过合作使双方获利的生物和社会关系。互助是相对于竞争而提出来的，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互助是其内核。”^②邱建生是关键性的乡建人物，从事乡建已十几年，作为客家人的他，近年来在家乡躬身实践“互助型社区”的建设与“平民大学”的开办。

因见他引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我便向他咨询了他如何接触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并如何看待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乡建中的作用。他说自己原来在做合作社的时候，便刻意想寻找相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性演说，因为乡建活动的一个重要对手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存在。2007年年底，他参加安徽一个名为“第三同共同体”的乡建组织所主办的活动，在活动展版中，这些乡建朋友将克鲁泡特金与梁瀚溟、晏阳初放在一起，作为乡建的重要人物，并在展板上介绍了克鲁泡特金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这引发了他深厚的兴趣。在随后的了解中，他发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作为相应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有力的竞争性理论资源，是摆脱现有“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思想的有力武器。随后，他将克鲁泡特金思想结合进他们所做的乡村合作与互助型社区建设之中。近几年，他们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纳入到合作社培训与学习之中，旨在让合作社骨干与社员认识到：互助而非竞争是人类第一生存法则，互助是更符合人性的生存解说。

从“晏中心”近年来对无政府主义的接纳与认可来看，无政府主义似与新时期乡建又建立了某种血脉联系，这是时隔近一个世纪的回归。不过，这种联系目前还主要在理论与认识层面，在乡建体系中并没有刻意凸显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其实，在他们所作的合作文化建设中，同样引入马克思与列宁的合作理论。乡建实践者是在用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对待各种理论与话语资源，不过，即便如

^① 当代乡建的主要力量有三支：梁瀚溟乡建中心、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有机农业发展（以众合作社为依托）。

^② 邱建生（2013）：《在地化知识体系与互助型社会系统的构建研究——以福建省P村和T村的平民教育实践为例》。未刊稿

此，也要看到消逝的无政府主义能在实践中重新占有一定的位置，已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晏中心“互助型社区”建设突出使用“互助”概念，并力行将“互助”实践融入到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相信伴随着互助实践的深入，克鲁泡特金思想所起到的指导意义会愈加深厚。不过，对于克氏的认同与使用，并不代表对全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全盘接纳。对于整个无政府主义流派和传统，他们持中立看法，但还是较认同无政府主义对资本和政治的许多批判有其道理，这些批判无疑也会成为他们的思想源泉。相应于当今社会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漠视与否定而言，也许这种中立态度，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肯定。

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这种选择性趋近，一方面向我们展示无政府主义思想仍有生命力，它可以作为另类社会实践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当今无政府主义的存在并非像20世纪初，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引介与践行，而是择其最益于实践的方面有选择性地使用。这提示我们，在看待无政府主义的当代意义时，要看到作为一个完整流派的无政府主义似已渐行渐远，但作为具体实践手段与工具的无政府主义还可为人所用，尤其是作为批判性理论资源时更见其火力之强大。

（三）未来社会发展中无政府主义面临的社会条件和契机

其实，从乡建人员对“互助”思想的吸收、再到对无政府主义的初步认可，这其中偶然性的个人因素，但也有其必然性的社会条件。当今乡村建设的本质被看成是“小资服务小资”^①，乡建的服务群体知识分子与被服务群体农民都隶属于小资群体，而因着乡建实践有“小资服务小资”的性质，那么乡建的方法与目标定会受到这两个同质主体的影响。

从中国的社会形态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变成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对大多数的社会；也没有像米尔斯预期的那样，变成一个白领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小农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最显著的一个悖论现实”^②。然而在看待中国社会形态的悖论性实践时，要重在分析小农资产阶级的真实经济与政治内涵。目前，农业小资产阶级不仅包括在乡务农的人员，同时也包括外出打工的部分，这两部分的农民行为又使得农业小资产阶级在意识与实践上具有某种双重性。

总的来讲，农村发展面临着如下的客观形势：一方面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低，

^① 作为乡建运动的核心人物，温铁军将乡建活动定义为“小资服务小资”，而这种服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体现为免于“小资沦为无产”。

^② 黄宗智（2008）：《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领导者》（双月刊）第3期。

农民很难靠传统的农业收入而维持家庭生计；另一方面农村中存在着“隐性失业”，一亩三分地的种植规模不足以吸纳全部的家庭劳动力，因此，出现了两种结果，一个显明的结果是农民外出打工，而另一个隐晦的结果是农民针对个体不能公平地共享农产品价值收益而作出的合作化努力。

首先，对于进城务工的2.5亿农民工而言，他们确实通过打工增加了家庭收入，城里工作即便赚得少，其现金收入也要远高于一般的农业收入。然而，在看到农民家庭因外出打工而获得经济收益提高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农民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间，却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他们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其工作又往往带有职业危害。农民工工资已多年没有实质性增长，与此同时，他们还基本处于没福利、没保险或低保险的保障状态。当前，农民工构成了非正规经济的主要部分。农民工用自己极度的忍耐成全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在看到因着他们极强忍受能力而出现的经济奇迹时，也要看到社会危机出现的潜在可能。农民工隶属于农业小资产者，虽然没有实质经济地位，但缘其有产者地位，在政治意义上还较偏稳态。但是农民工的无产化阶级式生产实践和生活待遇，却在客观上造成他们的某种无产阶级倾向，至少是具有集体意识和群体抗争性的。黄宗智亦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农民工会附带有一定的“无产阶级性”或“社会主义倾向”。

而对于在乡务农的人员来讲，相对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而言，农民的销售价格却一直较低。也就是说，在农产品价格绝对值较低的时候，农民收入有限，而在近年来农产品市场价格走高之时，农民面临的收购价格依旧很低，不能通过农业而实现增收的目的。就目前的农业发展而言，农民生计面临着许多压力。第一种压力来自其弱势的市场地位，如前文所提到的分散农户不具有市场谈判地位，客观受到各种农业中间商的盘剥；而另一种压力则来自城市资本下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许多农民因而成为季节性农业工人，他们经济收益虽略有提高，但生存的风险因“失地”而加大。在这种情势之下，知识分子和众多小农户已经客观地认知到这一困境，并力图用行动去扭转这种不利状况。

在新世纪之时，我国食品消费结构发生转变，加之食品安全问题频出，使得小农家庭经营面临新的历史性发展契机，因为小农家庭经营具有“资本—劳动双密集”的特性，正好适应了食品消费结构的调整^①，同时又满足有机农业的生产要求。小农家庭经营是相较于大规模机械化农场更具经济与社会合理性的选择。

^① 小规模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农场，一方面是适应了目前的食品消费结构，另一方面，符合未来农业发展趋势。未来高附加值的农业会朝着生态与有机方向发展，这样的农业生产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的密集投入和精细耕作。基于以上两点，合作社比公司会更具有竞争力。

针对小农家庭经营在生产方式上的竞争力和市场竞争上的劣势，基本小农家庭的合作组织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和有前景。黄宗智指出“小农场仍然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并不附带耕作上的横向一体化。合作组织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为了把小农场与规模加工和销售整合起来而自发地兴起的”^①。从现有形势看来，合作组织发育是农村困境的破解之法，因着它提供了优于龙头企业经营方式的制度供给，合作社实行的是按股分红或利润返还，而不是龙头企业的订单合同，农民可以切实地通过加入合作组织而获得更多的纵向一体化收益，而不是简单地沦为农业产业化的附庸生产者，或干脆成为农业工人。基于非横向一体化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组织，是符合小农特性的出路选择，它在符合小农自主独立经营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而带来增量收益；而且这种小农合作亦符合乡村社会社区性传统，可谓同时兼顾了小农户的个体性与合作性。

不过，在看待这种小农家庭的合作组织蓬勃发展之际，还要看到其合作基础及与外界力量抗衡的基础条件——“产权制度所起的作用”^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具有一定而又不完全的土地产权（只有使用权），在这个意义上，它（农民）既非‘无产’也非‘中产’”^③。这种暧昧的产权安排为我们理解小农的小有产者性质提供了重要暗示，小农作为小资产所有者身份是不完备的。他们在此种产权基础上所做的合作，既可以看作小资产所有者在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时，试图用合作来维持自己的有产者地位；也可以看成在外部压力面前通过合作免于沦为“半无产者”。从这种“一体两面”的努力来看：小农作为小资产阶级，他们既有资产阶级自身的稳定和向上攀升的驱动，同时也有在强资产和强权力面前所具有的抗争与弱者的联合。

综合看待小农这一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经济与政治双重性，可以用黄宗智的分析予以概括：“正如马克思和韦伯同样指出的，农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意义上乃是真正的‘中间阶层’。他们不会完全认同于资本家，也不会完全认同于无产者。一方面，他们之中有的人会想攀升进入资产阶级，也会模仿资本家的生活方式甚或政治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和无产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在当前的中国，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农民工’和工人阶级密不可分，乃是

① 黄宗智（2010）：《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八辑，第1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② 黄宗智（2010）：《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八辑，第2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③ 黄宗智（2008）：《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领导者》（双月刊）第3期。

一个半无产阶级。”^①因而，我们可以说：对于农民整体而言，他们无论在城还是在乡，都面临资本的强大压力，他们客观上能够认识且已经认识到这种压榨与压迫，并本能地意欲抵抗。但凡有产者要被迫沦落为无产者之时，他们都会采取手段来挽救自己的有产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乡村建设同样可以看成是对农民有产者地位的一种保护，乡建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反思——让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②

综上所述，此处试探性地提出一个问题，即“小资服务小资”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互动式乡建，其发展到底会朝向何方？依我个人观点来看，当今社会运动主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引入的是非阶级对抗话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质上要做的是社会改良。而相应于客体的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既受资本和权力剥削，存在一定的抗争性（无产阶级性），但又有小资产者的身份底色，有相对较强的个体化、自主性要求，其中虽亦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主要体现为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既不会完全认同于资本家，也不会完全认同于工人阶级”^③。

这两大行为主体，在当今社会发展诉求中体现了一种双重性：既有对自由（个体与独立）的极大追求，又有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强烈要求。这与前文中，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的无政府主义特性似有不谋而合之处，“无政府主义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交媾”。基于这样的客观形势分析，无政府主义思想可能会在中国（尤其是农村）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无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看似多么激进，他的行为和手段实则是最温和的，他们“避谈”政治进入社会，社会革命远比政治革命对胃口，他们更倾向于社会稳态结构。此外，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正好体现小农身份的双重性、手段易于被接纳以外，也要看到无政府主义对于自然与生态的论述亦非常贴合于农民特性和乡建发展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着对自然的绝对敬意，这与农民对自然与土地的感情又有极深的共通之处。而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以人为尺度”的发展方式所万万不具有的，对于自然和生态的态度看似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实则处于农民传统观念与乡建理念的最核心之处。

① 黄宗智（2008）：《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领导者》（双月刊）第3期。

② 温铁军对此有过如下的提问：“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学者们以为是历史进步，可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参见：温铁军（2012）：《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北京大学讲座。

③ 黄宗智（2008）：《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领导者》（双月刊）第3期。

最后，还是要在强调，即使在新时期有无政府主义回潮的条件和契机，也要看到对于无政府主义吸纳与使用，还是隐蔽性的，是对部分内容的借鉴。亦如上文指出，整体的无政府主义已经遁形，它正以零星的面孔与实践结合，它的某些主张、社会改造的手段，已经被创造性地使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在看待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之时，要看到中国社会行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一般都不引入明确的话语和学说，更不会引入主义，这与中国特殊的政治与学术环境有关。所以，在分析社会实践之时，重在日常表现与实践行动，而不在理论表达。也就是说，实践背后的理论体系是否被置于台前并不重要，只要能从实践中看到无政府主义的身影，就要肯定这种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长远意义。

五、无政府主义理想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青年处于爱做梦的年纪，无政府主义正可作为我们的梦想而存在，它是乌托邦，但也是理想之地。像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说：“乌托邦在地平线上，当人们走近两步，它也会后退两步，而地平线亦会退得更远。既然不可触及，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它的价值就是可以使我们往前走。”^①有了理想才会有行动的方向，才会有动力，理想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我们能否实现，而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之付出，为之努力，其实任何美好都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像地平线，我们只可能接近，却永远不能到达。放开想象，走出世俗羁绊，不要去想结果如何，只看重脚下的每一步是否坚实，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动者，而不是人生的投机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执着的体现，也教会了人们另一种品质——勇敢。

让我们暂时停止思考自己能不能有一个梦。看看全世界那些还在梦着的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②、古巴的卡斯特罗、墨西哥的马科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这是在拉丁美洲这个千疮百孔的大陆上，蠢蠢欲动的小草，为了迎接春天，而倔强地要冲破压在头顶的千斤巨石！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但请不要计较细枝末节的些许差别，而要记住无政府主义首先以反抗的姿态出现，它给强权者、给不公正以痛击！如今，我们真的已很难分辨哪些是无政府主义实践而哪些不是了，那些社区组织、那些自愿团体、那些生态区域组织，正如在前文中所提的乡村建设实践，其实不仔细分辨或深入了解，根本发现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手段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而

① 张翠容（2010）：《拉丁美洲革命现场》，第312页。法律出版社。

② 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于2013年3月5日下午4点25分去世，享年58岁。本文成文时查韦斯仍在世。

无政府主义做为整体的行动却是消退了，主义的消退与部分理念与手段的发展并行，构成了今日无政府主义的独特表现。

也许目前无论学者还是行动者，因着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和浪漫之名，因着它反权威的敏感，都不愿提及它。但正如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所指：“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梦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时俱进的进步。”^①我们的时代同样需要或更需要乌托邦的理想勇气，它才能走得更远。

总之，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思想不能一概置之不理：它已深深地烙在历史的长卷之上。无政府主义曾在它反抗的历史行程中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请不要怀疑，如果我们肯去重新发掘，它的理念在今日也一样会大放光彩。最后以一段乌托邦的经典告白结束这篇文章：

男人战斗，然后失败。尽管失败了，但他们为之一战的事情出现了。^②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Anarchist Thought and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Revisited

—Finding Contemporary Relevance from a Withering Anarchism

Haixia Wang

Abstract: Anarchism^③ as action seems destined to be a blurred historical memory; anarchism (communist anarchism in particular) as a resource for thought and for theory, however, h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not limited to a particular age. In this review of anarch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it is shown that certain ideas of anarchism, such as mutual aid,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dvocacy of social revolution, offer meaningful and realistic guidance for us. What is puzzling is that anarchism as thought and discourse has disappeared from China's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circles, serving neither as an intellectual resource nor as a target of criticism. Nevertheless practice always precedes

① 拉塞尔·雅各比（2007）：《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第2页。新星出版社。

② 周穗明（2007）：《马克思主义左派，还是无政府主义左派？——〈帝国〉与意大利激进政治中的极左思潮评判》。《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0辑，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 Anarchism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branches, individual anarchism, syndicalism and communist anarchism. Although these three branches have certain points in common, there is much tension among them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discuss all these three branches of anarchism in a short articl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latter, i.e., communist anarchism, with Kropotkin's anarchist theory as the focus.

theory, and anarchism, though ignored by intellectual circles, has been rediscovered in and applied to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new era. This suggests that anarchism withered away only on the surface, it is still viable in the soil of reality.

Key words: anarchism, mutual aid, social revolution, vision of rural reconstruction